

国学思潮批判

杨春时

摘要: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关键词:国学;西学;经学;儒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0)02-0095-07

一、何谓国学

五四后与 90 年代,国学思潮两度崛起。所谓国学,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而区别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国学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初,初见于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及刘师培所发起的“国学保存会”。章太炎筹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明确表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¹。刘师培等人创办《国粹学报》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可以看出,国学概念是相对与西学即现代学术而言的,是现代学术的对立面。西方的现代学术传入中国前,本来无所谓国学,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天下的观念,因此也没有国学的概念,它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天下的学术。只是西方文化传入,传统学术体制瓦解(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西学”即现代学术体制建立,包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分科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为了抵制西方现代学术,保守中国传统学术,才有所谓“国学”概念的提出。顾实曾分析认为:“海禁洞开,外患荐至,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凡若‘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而产生。”^①

大体上说,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具有这样几个规定性特征:

首先,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它继承儒家的学统和道统,因而有别于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国学是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因此,新儒学的特性基本上可以概括国学的特

作者简介:杨春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

征。虽然新儒学也标榜吸收西学,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然是儒家的,而不是现代的,是“西体中用”,而不是“中体西用”。李泽厚论曰:“(新儒学)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6]也可以说,这就是所谓当代国学的特征。

其次,国学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经世致用之学,有着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它的终极目的是“内圣外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中国现代历史条件下,国学派企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寻求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为中国乃至世界寻找有别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出路。简言之,国学是为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论证的学术体系。

复次,国学以经学为中心,是文史哲未分化的人文学科,而不是进行学科领域划分的现代学术体系。国学沿用注经、解经、训诂、考据等传统研究方法,而不是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李学勤说:“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点’。比如,所谓‘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佛、道,这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其中‘儒’是起主导作用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章太炎、钱穆所讲的国学史基本上就是儒学的发展史,对佛、道所述甚少。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尽管有人认为经学不切实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7]

必须说明,国学思潮虽然属于以新儒学为主的文化保守主义,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具有学科形态的、更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一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未必都赞成国学思潮,他们在坚持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也大力吸收现代学术思想,致力于现代学术体系的建设。例如30年代的“学衡派”就是学贯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而不属于国学派。当代学者李泽厚也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提出“以儒为主,儒道互补”,但基本上还是西学的功底,他也明确反对复兴“国学”。

再次,国学不等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不同于时下一些人所谓的“大国学”。一些国学派意识到国学的不合时宜,就企图扩大国学的范围,把当代的中国文化研究纳入国学之中,以混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限,使国学获得合法性。如张岱年先生说:“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该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8]这样,国学的地盘就被大大扩展了,即包括传统学术,也同化了现代学术。包括中国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立足于现代立场,运用现代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因此属于现代学术体系,而不是传统学术的延伸,不能把它们都归入国学。必须分清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限,不能混淆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与国学。事实上,在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就有人从启蒙主义立场对国学作出新的解释,企图扭转国学思潮的复古主义倒退倾向,并且把它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从而发生了“国故学”与“国粹学”之争。胡适就认为国学不是“国粹学”,而是“国故学”,而国故不同于国粹,并无保守主义取向,是用现代学术的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并创办《国学季刊》之时,胡适仍肯定地表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9]当代的国学派提倡的是

“国粹学”，而不是“国故学”，虽然它也试图包容“国故学”，但骨子里是“国粹学”。“国故学”与“国粹学”立场根本不同，不能混杂在一起都称为国学。我们所批判的，也是“国粹学”，而不是“国故学”。这一点，必须分清。

二、国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当前，国学热从学术界、大学蔓延到社会，并且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国学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宣扬，国学成为爱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如官方的祭孔仪式、孔子学院的设立等。第二，文化市场的运作，国学成为大众文化的资源，如百家讲坛等。第三，进入学术体制，成为正式学科，如儿童读经、国学学科和国学院的设立等。

国学起于对抗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也是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上的反应。国学思潮的兴起，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传统中国是“王朝国家”，没有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从而引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才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这个历史阶段，为民族国家张目的民族主义兴起，国学思潮也应运而生。因此，国学思潮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相关的，从而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章士钊有言：“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③钱基博认为：“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勿自暴也。”^④郑奠也强调：“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⑤

有人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表证，所以国学具有现代性，属于现代学术范围。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国学概念是抵制西学，也就是抵制现代学术的。为什么在中国，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思潮并不具有现代性呢？原因是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现代性在西方，本来是与现代民族国家一体的。但是在中国，由于现代性发源于西方，而非本土文化，因此争取现代性就要学习西方，现代化即西化，甚至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实践。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又是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敌人，因此，争取现代民族国家就要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就要反对西方现代文化以及现代性，并且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获得“支援意识”。五四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运动转换为革命运动，西化思潮转化为回归本土文化的思潮。新时期的启蒙思潮衰落后，民族主义取代世界主义。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了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学术的反思，新儒学和国学思潮兴起。从根本上说，这源于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冲突。

国学思潮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性质。五四以后与90年代以后，历史情境惊人地一致：新启蒙运动中止，文化保守主义兴起，产生批判启蒙主义、回归传统文化的动向。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也引发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国学思潮两度兴起。国学思潮主张恢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就是实用理性和集体理性精神，对抗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个体价值为中心）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性和现代学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现代文明。这就是说，国学思潮是在学术领域反对现代性、回归传统文化的运动。因此，作为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反应的国学思潮，就不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学术，而是前现代性的学术、反现代性的学术。

当代国学思潮的兴起，有诸多社会原因。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如果不加以调整，就难以发挥对社会意识的整合功能。由于拒绝西方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唯一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因此儒家思想被官方认

可,获得了合法性,从而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空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从而引起了对现代性的反弹,产生了以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为核心的反现代性的文化思潮。国学接续了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来自传统的“支援意识”,因此能够迅速崛起。此外,国学热也有学科体制的支持。在当前的学科体制中,开辟一个新学科,就等于开发了一种学术资源;而建设一个国学机构,也无疑于扩大了学术权力。国学满足了体制内官员、学者争夺权力和学术资源的需要,因此获得了官方、学术机构和相关学者的支持。同时传统文化和学术成为大众文化的思想资源,被媒体炒作,进入文化市场而得以传扬,形成“国学热”。

三、国学思潮的反现代性性质

国学以儒家学说为本,以新儒学派为主体,以延续儒家道统、学统为宗旨。儒学属于前现代性思想,它们都缺乏现代理性精神,也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里说的人文精神是指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排除了科学精神,这一点毋庸置疑。儒家也重视人伦,不崇信宗教,但由于集体理性排斥了个体价值,因此与现代人文精神相背。正是由于这一点,五四和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才开展了对儒家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为现代性开辟了通路。五四以后,在启蒙运动夭折的历史条件下,新儒家学派批判五四,抵制西方现代文明,企图重建儒家文化传统,实质上起到了阻碍现代性发展的作用。而二战以后的海外新儒学,则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深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端。虽然它不可能实现以儒家思想拯救西方文明的梦想,但作为一种思想批判,仍然会发挥纠正现代性弊端的积极的作用。而当代中国的国学思潮,是在与西方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在建设现代性的历史时期,用传统文化抵制现代文明,这只能延缓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其实践作用是弊大于利。

国学派认为西方的现代学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不能走世界共同的道路,而要走自己的特殊道路,这个道路就是由儒家学说指引的道路。而事实上,尽管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但在现代条件下,人类文明的分隔、对立已经被互相交往、融合取代,现代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选择。因此,学术现代化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其他避开现代文明和现代学术,保存传统文明和学术,只是一种倒退和幻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更需要建设现代性和现代学术,而不是以传统学术来抵制现代性。

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国学派为中国现代化开出的药方并不对症。国学派认为,现代性提倡科学功利,压制了人文性;提倡个体价值,造成社会分裂、对抗,只有儒家倡导的伦理中心、集体本位精神,才能克服现代性的弊端,指引走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建立和谐社会。确实,国学派对现代社会弊端的批判并非无理,而且正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似乎相合。但是,问题在于,集体理性、伦理中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与个体价值背道而驰,不能以文化倒退的方式,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现代化,而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本质,不管有什么缺陷,也是唯一的选择。不能以现代性有缺陷就拒绝、否定,那样只会掉进“社会病理学”和社会乌托邦的陷阱。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什么为指导,是现代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还是传统理性(实用理性和集体理性),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国学派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取代现代理性,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脱离世界化进程,背离现代性(或者拥有另一种现代性),另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实际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而不是如汪晖所说的:西方有西方的现代性,中国有中国

的现代性,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现代化只能以现代性为指导,而不能以前现代思想甚至反现代思想为指导。儒家反科学、反个体价值的思想体系,只能阻碍现代社会的建设,而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建设。当然,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合理的因素,一些个别观念可以从其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现代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但其前提是打破儒家思想体系,特别是转化其核心价值取向即集体本位的价值观和伦理中心主义,建立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主体的思想体系,而把儒家个别合理的思想纳入其中。这就是所谓“西体中用”,而不是“中体西用”。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够成功。而离开了现代性方向,中国的现代化就可能夭折。

儒学能否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从而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当年一战结束后,梁启超就曾经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也可以成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指导思想;二战结束后,新儒学也认为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可以取代现代西方文明,但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一预想。确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道德滑坡、信仰失落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有现代性本身的缺陷,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传统价值观念失效而新的价值观念受阻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体价值具有了经济基础,而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理性的意识形态失效。这就要求建立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新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但是,由于改革局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与文化思想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把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念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排斥,于是,出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不相容;个体价值仅仅在经济领域具有合法性,而不能升华为具有约束力的、自觉的、普遍的价值规范,从而导致物欲横流的狭隘个人主义。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只能建立在个体独立的社会关系之上,只能是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集体理性与现代社会生活背道而驰,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理性一样,不可能有效地规范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儒家的尊尊亲亲的家族伦理建立在血缘关系扭结的传统社会关系之上,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的价值规范,也不能转化为现代的价值规范。

更为重要的是,反现代性的国学不适应今日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由于历史的迁延,中国现代性至今尚未完成,启蒙主义并没有胜利,科学、民主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当代中国需要现代性,而不是反现代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需要加强现代学术建设,特别是向世界现代学术开放,尽快进入现代学术的主流,而不是反对现代学术,向世界学术封闭。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学术建设还刚刚起步,还相当落后,这时以传统文化抵制现代文化,以传统学术抵制现代学术,其负面作用远远要大于正面作用。

当然,客观地说,国学思潮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源性,导致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这种批判有其合理性,但是也产生了对它的整合、利用的偏颇。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国学思潮可以看作对现代性偏颇的反拨,而且客观上也可能会起到对西化倾向的某种制约作用,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保护。但是,从总体上说,国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反动,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倒退。

四、国学是与现代学术相背的伪学科

国学作为一种学术规范,也是与现代学术相背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就是与世界现代学术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学术。学术无国界,学术具有世界性。国学实际上是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隔离开来,这在世界化、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此,表

面上的东西之争,实际上是前现代与现代之分,拒绝现代学术才是国学的本质。

首先,国学对自己的学科规定表明其不属于现代学术体系。第一,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对象,是文史哲等混融在一起而未分化的人文学科。它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科,也不具有科学性。现代学术分化为各个学科领域,首先是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诸学科的分化;其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分化,形成了文学、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独立的学科,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混融一体、包罗万象的学科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脱离现实,学术价值也有限。即使研究儒家经典,也不是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需要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多种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而不是传统的、未分化的经学。

其次,国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现代的、科学的。它信守儒家观念,以注解、阐释经书为主要方法,实际上是以意识形态论证代替了学术研究。现代学术已经独立于意识形态,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加以区分,确立以现代理性指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那种“实用理性”的、以信仰代科学、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前现代的研究方法也已经失去了合理性。

按照国学的学科规范来衡量当代的“国学”,几乎都不合格,它们不过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拼凑。当代学者各自具有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的学术修养、知识构成、研究方法都来自现代学术,而与传统学术无缘。他们也不可能不运用现代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因此,国学不是中国文化研究,无论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学,严格地说都属于现代学术范围,而与国学无关。

国学学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还要看国学派(主要是它的代表新儒学)是否完成了儒学的现代转换,从而复兴了儒学。新儒家明白国学必须适应现代社会才能生存,于是,它们力图使国学与现代学术融合,使儒学现代化。但国学反现代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拥有现代性。为了对抗西方学术,他们不是用现代学术改造、吸纳传统学术,而是以传统学术改造、吸纳现代学术,以达到“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目的。但由于国学的基本理念与现代性的不相容,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国学并没有“西学”之外构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品格的学术体系。在新儒家的发展历程中,有所谓“儒学三期”说,其代表人物有:儒学一期的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等,其中熊十力成就最著。儒学二期的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其中冯友兰的“新理学”成就最著。儒学三期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其中牟宗三成就最著。这些新儒学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的思想和方法来论证、阐释儒家学说,企图打通中学与西学,使国学获得现代性,以期获得儒学的新生。虽然作为一家之说,他们各有创造,但在总体上难以克服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根本矛盾,也没有建构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具有现代品格的学术体系。一方面,他们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国学的范围,大量借鉴、运用西方现代理论来论证儒家思想,所以不是纯正的国学,而打上了现代学术的烙印。另一方面,他们的学说与现代思想相隔膜,往往陷于自身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很难成为现代学术的建树。从学科建设上说,新儒学只是在为儒家学说做起死回生的工作,并没有突破现代学术而复兴国学。这就是说,新儒学并没有使儒学传统得意延续、新生。新儒学虽然名噪一时,但并没有获得中国、西方主流学术的认可,也没有对世界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在五四前后,新旧交替、东西杂糅的时代还有几个“国学大师”存在的话,那么当代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的了。

由于当代国学思潮旨在复兴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背道而驰,因此尽管国学概念已经出现有百余年了,但至今也只是一种话语,而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学科。国学派主张在实践中大大地打了折扣,无法实行。这是由于依据传统学术的国学与现代学术体制不能兼容,国学学科无法

立足。五四乃至当代大学体制中实际上实行的国学还是“国故学”，而不是“国粹学”。比如1923年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其“国学门”正式分列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五类。又如在1925年厦门大学筹办国学院之时，“国学”所涵盖的学科已经扩大为哲学、文学、历史古物、社会调查、博物、经济、法政、教育等等14大类近30余种学科了。这些大学里开设的所谓国学，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如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文学研究等，都属于现代学术范围。如激烈反对国粹派、批判国学思潮的鲁迅，就曾经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教授，他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属于中国文学学科，是一门现代学科，而不是“国粹学”。现在一些大学设立的国学院或者国学研究机构，实际上也是“国故学”，即对中国文化的的研究，如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它们已经分门别类，分属于不同的大学科（如文、史、哲等），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国学，是一种画蛇添足之举。这说明，国学学科在实践上行不通，无法取代现代学术，无法进入现代学术体制。

总之，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国故学”的国学，早已经存在并且分化到各个学科领域，没有必要再加以单独提出，因此没有存在的必要；作为坚守儒家立场、方法的“国粹学”的国学，早已失去了合理性，消失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了，而它的当代形态，只是一门伪学科。重建国学，只是反现代性思潮的一种运作，而并不具有学术本身的意义。传统学术的消失，这是历史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当然也有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对于这种遗憾，我们只能尽力补救，也就是把传统学术改造、吸收到现代学术之中。

注释：

¹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1905年版。

^④ 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5页。

^④ 《略论现代新儒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第265页。

^{1/4} 李学勤：《我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2009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

^{1/2} 张岱年：《说“国学”》，《中华国学》创刊号，1989年版。

^{1/4}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23年1月出版。

^⑥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七号，1905年版。

^⑦ 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⑧ 郑奠：《国学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第5页。